

论苑隅踪

周志公

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



序　　言

书林茫茫，犹如碧海。能在有限的生命旅程中情深意笃地漫步于书林，委实是种莫大的享受。尽管那因人而异的足迹，在纵横延展的幅度上有其遐迩宽狭之别，但就明目慰心，启智开慧，排忧释惑，悟生存志，建功立业等诸般益处来说，却是有着共同感受的。人之于书，或视为伴侣，或视为良友，或视为导师，总是离不大开的。自然，众多的学海名流与书构成的动人佳话，也是不绝如缕，在在皆是的。

笔者戏望投足于书林，眼福来之见迟。少时家贫，与书无缘，待红旗高悬于国都，怀情人校就读之时，方才渐晓书可香人之道，并且在所习中文专业的盘桓步履中，留下了浅淡的印痕。“文革”十年，教坛冷寂，派仗不止，纵然有少许内容雷同的书刊，可以消磨那喧嚣不宁的白昼，但却难以打发那明月临窗的夜霄。于是也便在法定的时间内三重四复地阅读“毛选”的同时，乘暇翻览了当时能够见到的马恩列斯的全部译文，写下了50余本达200万字的读书札记。此外，《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一类的史书，也是在此期间读过的。虽然谈不上什么研究，且近乎于走马观花，但却进一步体会到高尔基所说的那句朴素话语的妙处，即“对于有文化的人，读书是高尚的享受”。就是从组成生命的材料——时间来说，也算是没有完全无为的空损。倘说十载风云尚有对疾驰的岁月留有回望的踪迹，也即在此吧。

拨乱反正后，曦月朗照，书林欣荣，其盛况实为前所未有。此时此刻，虽因走出讲堂，就事于机关，余暇甚少，但却依旧偷闲涉足于昔日乐为观赏之一端，思味着书林代有传递的宝贵的精神

遗言。思而有感，也便断续地写下了百余篇论文，见发于《博览群书》、《东岳论丛》、《山东史志丛刊》、《青岛师专学报》、《青岛研究》、《石家庄史志》等省市内外的有关刊物，并继杂文选集《绿屿苔痕》出版之后，拣其 20 余篇，结名为这《论苑隅踪》。

集子内的文章，既有应征性的特约文字，又有方志专业性较强的文字，还有地情考索性的文字。编排时则按其内容大体作了归属，并分别注明发表的年月。末篇《应用文简论》，则是因为较长时间于机关从事文字工作，接触应用文之类的体裁较为频繁，且就某些部位发表过有关的文字，所以也一并收编进去视为书林一隅之萍踪。

作者

1995 年 5 月 1 日

目 录

人·导师·旗手

- 纪念鲁迅诞辰 105 周年 (1)
- 略谈分配原则与共产主义道德观 (8)
- 理想·信念·风范

 - 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 70 周年 (17)
 - 审美教育散论 (25)
 - 意识形态的灵魂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36)
 - 略谈旅游活动与发展科学文化 (43)
 - 书喻杂摭

 - 读书札记 (53)

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中国文化的典范

- 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 (60)

树立质量第一的思想 编好社会主义新县志

- 评《莱西县志》稿 (76)
- 大事记编写十戒

 - 评《崂山县志·大事记》稿 (93)

- 地方特色是志书的基本特征

 - 评《即墨县志》稿 (102)

- 体现时代特色是新方志的基本要求

 - 评《胶州市志》稿 (115)

- 概述撰写五贵五宜五不宜

 - 评《胶南县志·概述》稿 (130)

志书科学性四题

——评《黄岛区志》稿	(143)
志书序文撰写漫议	(159)
志稿总纂十忌	(163)
教育志编写十题	(174)
略谈城市人物志的撰写	(179)
立传人物求疵例说	(183)

青岛旅游资源和开发利用	(188)
青岛人文资源述要	(203)
青岛名称昔今谈略	(217)
百年春秋青岛港	(228)
指点崂山话景观	(232)

应用文简论	(237)
-------	-------

人·导师·旗手

——纪念鲁迅诞辰 105 周年

疾驰的岁月，流水般地逝去。十年前的今天，即在鲁迅诞辰 95 周年、逝世 40 周年之时，我曾以青岛市教育局“纪念鲁迅筹备组”的名义，分别在兰山路礼堂、工人文化宫礼堂向部分中教系统的干部、教师和工会成员作过题为《鲁迅精神永存》的报告。之后，在工作之余，也时常读点鲁迅的著作，并留下些阅读札记一类的东西。现在重新浏览一下那些片断的随想，似觉分外亲切，甚至把已经过去的十载春秋连缀起来化为一种感思。这感思就是纪念中的话题：《人·导师·旗手》。

(一)

鲁迅，作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首先让我们感知到的则是个堂堂的中国人。他同我们一样，同是炎黄子孙，华夏后裔，同样有着七情六欲。虽然他所处的环境与经历跟其他人不尽一致，但却有着中国人某些共同的思想感情。鲁迅的青少年时期所受的教育是封建性的宗法礼教，大约从 7 岁至 17 岁是在家乡的私塾内读书的。这期间，他既流露出对封建奴化教育的强烈不满，又流露出因祖父冒犯清廷，自投下狱，家势日渐衰败，以及父亲连年生病而早逝的忧思和感伤，还流露出为能够幸运地接触农村的诸多童年伙伴并结下真诚纯朴的友情而欢欣的思绪。总之，家乡的一切，都在他的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离开了桑梓之地，便开始了鲁迅 10 年之余的南京求学和日本留学时期。于

南京求学时，开始，是入水师学堂，后来则入路矿学堂，此时鲁迅的感情世界，不满现实的思想情绪占了主流。他曾因多次嘲讽水师学堂里那些令人窒息的繁规陋习而被学校记了两次大过两次小过，差一点被开除学籍；也曾因“戊戌变法”的夭折，“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八国联军”的入侵，“辛丑条约”的签订而忧心忡忡。为此，他以按捺不住的心情披阅了大量的有进步倾向的文艺和科学著作，增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意识，并带着寻求救国的真理而东渡日本求学。在此期间，鲁迅的视野进一步得到了扩展，从思想到行动都表现出“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爱国决心和勇毅。当他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时，曾因听过旧民主主义时期的革命家和学者章炳麟发起举行的“中夏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而毅然剪掉了头上的辫子；当他离开东京去仙台学医期间，因看过一部反映日俄战争的记录片中有一中国人替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人捉到砍下头来示众而周围站满的许多中国人却显出十分麻木的情绪时，便断然离开了对他颇为赞赏的藤野先生，重返东京走上了弃医就文的道路；当他目睹了旧民主主义的革命团体相继成立，且旨在推翻腐败的清朝统治时，则积极参加了章炳麟领导的“光复会”。与此同时，还亲自撰写并翻译了许多进步性的作品，以为发展中的革命运动推波助澜，并以此为武器而奋斗了终生。在这里有必要提一下鲁迅对他的前妇朱安的态度及思绪。1906年，鲁迅于日本回到了家乡，并在母亲的直接操办下与朱安举行了婚礼，但婚后的第四天就借故返回了日本。待鲁迅回国后，一直是淡淡无味地接触，并较长时间过着独身生活。1919年12月，鲁迅卖掉了故乡的老屋，携母亲与朱安定居于北京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11号时，依旧延续着并无爱情的婚姻。虽然有人建议将朱安送回娘家，了结这旧式的婚姻，但鲁迅却没有这样做，他担心一个弱女子抵挡不住家乡的白眼和舆论，甚至会弄到自杀的地步。待鲁迅与许广平结为伉俪时，朱安依然留在鲁迅母

亲的身边，直到85岁高龄的鲁母去世之后，她才于1947年结束了生命。从这里可以看出鲁迅那种复杂的心绪和对一个弱女子的宽厚同情心。事实上，鲁迅对母亲的孝敬，并不等于他不了解母亲存有的旧观念；鲁迅对朱安的迁就，也不意味着他的软弱和怯懦。由此看来，鲁迅于家事、国事、世事的观察和处理上，均有着自己的见地、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自己的决择。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一个人只有始终充满了奋进的情绪，具有真才实学，并且善于体察周围的环境，关心他人和国家的命运，才能做到既了解自己的力量又能够适当而又谨慎地使用自己的力量，才能在纷纭复杂的世俗事物中显示出伟大的品格和超人的胆识。而鲁迅也正体现着这样一种精神。

(二)

是的，鲁迅是位忠实于自己的人。也正因为他忠实于自己，才具备了超尘拔俗的高贵品质，并以其嘉行懿德去影响他人，教育他人，指导他人。鲁迅从日本回国后，在原籍为教三年。他除了教书之外，还积极参加了一些社会活动，不仅与“光复会”保持着联系，而且还参加了与“光复会”有联系的团体《南社》。当1911年武昌起义之后不久杭州予以光复的消息传至家乡时，绍兴城举行了一个群众大会，鲁迅则被推为群众大会的主席；当他听到有些逃窜的清兵要来绍兴时，立即纠集了一批学生，并将平时操练用的枪支发给他们，组织了一支“武装演说队”，平复了民众骚动不安的情绪，而且还连夜带领学生到寒冷的河边去迎接入城的革命军。由于他用自己的行动引导青年学生支持“辛亥革命”运动，所以也就赢得了广大青年学生的信赖和尊重。但是，当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夺以后，鲁迅则又以愤激沉痛的心情期待着新的革命形势的来临。不久，即当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喜讯的到来和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之时，鲁迅则又勇敢地站

到了斗争的前列，并在反对复古倒退、提倡新文化的战斗中，成为一代青年的不屈不挠的反帝反封建的楷模。1925年至1926年，围绕着“女师大”的学潮，更加显示了鲁迅主持正义的立场和斗争精神。当“女师大”学生因反对不学无术、思想守旧的校长杨荫榆主持校政而被粗暴地开除了刘和珍等六名学生会成员，并被教育总长章士钊下令解散“女师大”时，鲁迅立即和富有正义感的教师组织了“校务维持会”，且设法另租屋子为学生授课。当章士钊以此下令免掉了鲁迅在教育部的佥事职务时，他依然没有退缩和回避。当1926年3月12日日本四艘军舰侵入中国领海大沽口，共产党人李大钊等人组织工人、学生数千人于天安门前集会游行示威而被段祺瑞执政府下令卫队开枪并打死打伤200余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时，鲁迅则以无限悲愤的心情称此事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并为“女师大”的刘和珍、杨德群两名学生的牺牲而写下了《纪念刘和珍君》的文章，以示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血泪控诉，即使因此而被反动政府通辑，也毫不畏惧。从而，更加得到了广大青年学生的尊敬和钦佩。1926年8月，鲁迅离开了工作战斗15年之久的北京，前往厦门大学任教，不久又到了广州中山大学，总共约一年左右的时间。在中山大学，鲁迅接触了不少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同样受到了他们的热烈欢迎和爱戴。不久，当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叛变，血腥地镇压共产党人时，中山大学就有40多名革命学生被捕。为此，鲁迅生先曾四处奔走，千方百计地设法营救学生。即使在国民党当局想把他当做共产党员杀掉，他也没有改变其正义的立场。至于鲁迅在文艺战线上，呕心沥血地指导大批文艺爱好者进行创作的事迹，那就更加感人肺腑。为千万人勤奋工作，为千万人谋求幸福，为正义的事业奔走呐喊，给邪恶的势力予以挞伐，奋进不息，战斗不止，“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就是鲁迅作为一切革命者之导师的光辉形象和无限魅力之所在。

(三)

鲁迅自从弃医就文以后，一直战斗在文化战线上，并成为文化革命的旗手。在他定居上海之前，除了教书和于教育部任职之外，其余的精力均用于创作、翻译和办杂志。定居上海后，则专门从事文化革命工作。他的著述，除了“日记”和“书信”以外，写了近600万字的著作，同时还翻译了250余万字的作品。他创办的杂志则有《新生》、《语丝》、《莽原》、《奔流》等。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既是对鲁迅作为文化革命旗手的充分印证，也是我们得以继承发扬的精神财富。鲁迅一方面用它的饱含时代色彩的作品在“五四”时期，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所竖起的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奠定了现实主义新文学的基础，另一方面又以“左翼作家联盟”为阵地积极地领导了文化革命运动，并在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反革命军事围剿的同时所进行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中，扶持、推进、开拓和发展了文化革命事业。从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显示出他高瞻远瞩的视野和卓然超迈的气魄，以及作为文化革命旗手的先锋模范作用。值得注意的是，鲁迅所从事的文化革命事业，一直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关怀下进行的，而鲁迅对党的文化路线、方针、政策又是极为拥护和赞同的。鲁迅接触过许多的共产党人，而且也很信任。早在“五四”运动前后，他就接触过《新青年》的杂志主编陈独秀和《每周评论》的主编李大钊。1927年3月，上海工人在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所举行的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成功，并配合北伐军分别占领了上海和南京的消息传到鲁迅耳边时，他在万分高兴之余，于同年5月5日挥笔写下了热情洋溢地称颂胜利的文章——《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1931年1月，当中国左翼作家、共产党员柔石、胡也频、白莽、李伟森、冯铿五位同志被国民党残酷地杀害后，鲁迅以极大的愤慨和无限悲

痛的心情写下了《为了忘却的纪念》及《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等文章，以示对从事文化革命事业的优秀共产党人的悼念和敬仰。当1932年的夏秋之间，红军将领陈庚与鲁迅会面后，他始终珍存着一份当时陈庚写下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形势图。1935年10月，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取得胜利后，鲁迅和茅盾等亲自给毛泽东和朱德打电报表示祝贺，并且充满信心地认为：“中国和人类的未来，都寄托在你们身上。”1935年12月，鲁迅还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表示坚决拥护，并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书上签了名。至于他为方志敏烈士转寄给党中央的《可爱的中国》一书和他为瞿秋白烈士抱病编校《海上述林》的动人事迹，则更加为众人所晓。凡此，都说明鲁迅对党是坚信不移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自然，鲁迅以有为民族独立和解放而流血奋斗的共产党人感到光荣，而共产党人也以有鲁迅这样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和文化革命的主将与旗手而感到自豪。所以自豪，就在于鲁迅代表着文化革命的前进方向。对此，毛泽东的评价是：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简略地回顾一下鲁迅走过的道路，即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激进派到新民主主义的自觉战士，从相信进化论到坚持阶级论的转变过程，便可深深地感悟到：鲁迅既是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伟大爱国主义者，人民的伟大儿子，又是一名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士和导师，还是一位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伟大巨匠和旗手。鲁迅生前，并没有想到他能获此殊荣，也没有想到他如此伟大，正因为他没有想到这一切，而始终为着民众、为着国家、为着人类去创造幸福，并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才显示出他伟大的形象

来，才受到人民的称颂。值此鲁迅诞辰 105 周年、逝世 50 周年之际，我们更应该以鲁迅为榜样，大力弘扬鲁迅的精神，努力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从而为四化建设增光添彩。

1986 年 6 月 30 日

略谈分配原则与共产主义道德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的工作重点已经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搞经济建设，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用经济的办法管理经济，所需要的是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来进行有效的劳动。而劳动，按现行政策的规定，是要有报酬的，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要求普遍实行不计报酬的共产主义劳动。这一现行政策的规定，在生产尚未高度发达，劳动还只是谋生手段的历史时期，是切实可行的，也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假如不按这条现行政策来办，勉强地、普遍地实行不计报酬的共产主义劳动，只能造成生产下降和“吃大锅饭”的不良后果。这个问题，通过前一段的实践，人们大都有了共同的认识。但由此又引出了另外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那就是有些人在执行按劳分配的政策时，却低估了宣传共产主义道德的重要意义。他们认为现在既然还没有普遍实行不计报酬的共产主义劳动的物质基础，也就没有宣传共产主义道德的基础，因此，提倡共产主义道德似乎为时过早，现在提倡则很容易再度引起“共产风”，影响“按劳分配”的现行政策的贯彻执行。这种观点程度不同地影响着一部分人，因此也就有必要展开深入的探讨，以进一步明确执行现行政策和提倡共产主义道德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提倡共产主义道德的物质基础

恩格斯讲：“一切已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34

页)这两句话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说，经济产生道德。就是说，道德要有物质基础，这个提法乃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的基本观点。二是说，道德有阶级性。也就是说，各个阶级由于经济地位不同，生存条件不同，利益不同，必然各有各的道德观念，根本不存在所谓永恒的统一不变的人的道德。阶级的道德，是同阶级共存亡的。一个阶级一经出现，它的道德观念也就随着出现。

明确了道德有物质基础，那么现在提倡共产主义道德的物质基础又指的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现代的社会生产、现代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现代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以及作为这种现代化生产力的代表——无产阶级。这些事物，应该说，在资本主义时代就出现了；共产主义的道德，也是在资本主义时代就出现了。列宁说过：“为巩固和完成共产主义事业而斗争，这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基础。”（《列宁全集》第四卷第355页）又讲，共产主义道德“是为破坏剥削者的旧社会、把全体劳动者团结到创立共产主义者新社会的无产阶级周围服务的。”（《列宁全集》第四卷第353页）从这里可以看出，自从地球上有了无产阶级，有了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运动，共产主义的道德也就随着出现。共产主义事业是无产阶级利益的根本所在，共产主义道德作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不能不是同这个事业的需要相适应的。谁都知道，我们的国家不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国家。但是，在解放以前，现代工业已经在国民经济中占有10%左右，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已经生长起来，无产阶级已经有了几百万人，工人运动、共产主义运动也早就蓬勃发展了。这表明，共产主义的道德，民主革命时期就存在。许多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千千万万的共产党人为民主革命壮烈牺牲，也是为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英勇献身，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共产主义道德精神，至今仍需要我们学习和发扬。决不能这样说：在现在的历史阶段，只有具备了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并且可以普遍地实行不计报酬的共产主义劳动了，才算具备了共

产主义道德的物质基础；也决不能把共产主义道德的物质基础同实现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混为一团。要实现共产主义，当然必须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使社会“不必在分配产品的时候规定每人应当领取的产品数量”，而由每人“按需自由的取用”；（《列宁选集》第三卷第254页）人们进行劳动不再是谋生，而是劳动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到了这种时候，劳动才是不计报酬的劳动。而共产主义道德则是截然不同的，如列宁所说，它的基础是为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而奋斗。这是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人们都应该有的一种精神气概。这些人认为自己生活在世界上就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舍此，生活也便失去了意义，失去了光泽。这样的道德，它的物质基础，不只是现在，而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经济制度以后就形成了。既然如此，为什么在我国已经消灭了剥削制度的情况下，竟然提出共产主义道德的物质基础还不具备这样的问题呢？问题在于许多人担心再度引起“共产风”，“吃大锅饭”，左倾蛮干，破坏生产之类的问题。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也可以说是不无理由的，但因此而提出在执行按劳分配的现行政策的情况下，提倡共产主义道德缺乏物质基础，显然是没有道理的。

二、提倡共产主义道德的实践效能

提倡共产主义道德，对执行现行政策是有利还是有害？显然是有利的。因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共产主义道德作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职能就是从道义上调动全体劳动者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并协调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维护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现行政策与共产主义道德的作用是相互配合的，将现行政策与共产主义道德对立起来的观点是极其错误的。

什么叫现行政策？现行政策，是党和政府根据当前经济水平

以及相应的人们的思想水平而规定的各项政策。这些政策的规定，人们都得遵守和执行。但在执行的过程中，其结果却有很大的差别。如果人们没有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仅仅是为了赚钱吃饭，为了个人和小单位的利益，就会有意无意地做出若干不利于整个国家和集体的事情，延缓前进的速度。尤其是在我们这样一个法制还很不严密的国家，很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弄权作弊，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以及形形色色的不正之风，之所以迟迟不能有效地制止，同共产主义道德水平不高是分不开的。反之，如果人们都具有共产主义的思想和道德，他们就会主动地帮助国家、社会堵塞漏洞，减少一些损失，克服不正之风，加快前进的速度。我们党的事业，不能只限于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事实证明，能够在社会发展中起作用的并不只是这一个方面。以按劳分配为例，由于它直接给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利益，所以它是推动生产和推动社会发展的十分巨大的力量。但是，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并不是只有这样一个来源。如果人们有了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变成了自觉地创造历史，他们就会更多地想到社会和公共的利益，这同样可以成为生产积极性的巨大来源。事实上，有许多劳动是很难计量的，碰到这种情况，多劳多得的政策就不能实现。这时候，能够推动人们努力劳动的，就只有对社会和公共利益的考虑，这在我们的国家里是司空见惯的。这种情况说明：一定的物质文明固然是产生道德的物质基础和保证，但道德也不是消极的、被动的，它对精神文明有着强大的反作用。正如斯大林所说：“新的社会思想和理论……一经出现，它们就会成为促进解决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所提出的新任务，促进社会前进的最重大的力量。”（《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38页）所以说，就是只从生产考虑，也不能仅限于讲按劳分配，而不提共产主义思想道德。这是提倡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有利因素的第一点。

第二点，提倡共产主义道德的教育，还有利于造就和培养共

产主义新人。还有现行政策不是一成不变的，按劳分配的政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如果社会向前发展了，政策有了新的规定，而人们的思想不能适应变化了的要求，那就会出现僵化的状态。毛泽东同志经常教导我们要适应新情况，研究新问题，就是指此而言。共产主义革命，是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是历史上任何革命所不能比拟的最彻底的革命。要完成这样的革命，没有大量的高度自觉的人是不可能的，而高度自觉的人就是同传统的观念彻底决裂了的、具有全新的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的人。这样的人，不可能自然成长，信念也不是自然形成的，它需要不断地灌输新思想、新观念。这种新思想、新观念，就是共产主义道德观念。有人认为，只要政策好，使人们得到实际利益，人们就会说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社会就会较快地前进，这当然是不错的。但仅仅停留在因得到利益而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是很不够的，还必须认真学习和理解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建立起共产主义一定会胜利的信念，树立起为共产主义而献身的精神道德。从这个角度讲，要有效地执行好按劳分配的政策，就必须大力提倡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提高每个人的政治觉悟，培养和造就具有高度文化科学水平和共产主义思想的一代新人。总之，提倡共产主义道德，对执行按劳分配的政策是不矛盾的。共产主义道德不仅可以帮助人类社会升到更高的水平，而且对于培养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人，对于加速四化建设，对于实现人类的美好的理想，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三、提倡共产主义道德的规范要求

共产主义道德规范是无产阶级在社会生活中所应该遵守的行为准则。共产主义道德的内容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而不断向前发展的。它是按照共产主义事业的最终